

我空降兵作战技能达到新水平

随时能飞 到处能降 降之能打

据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九日电 (通讯员薛军 记者蔡晋武)中国空降兵部队野战空降训练,已经达到随时能飞,到处能降,降之能打的新水平。

空降兵部队是现代立体战争的重要角色,近年来,空降兵部队立足现代化立体战争舞台,着眼敌后突击作战的目的,对训练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把部队拉到高山丛林、沙漠高原以及江南诸岛等各种复杂地形和各种复杂气候条件下,开展高难度空降野战生存和作战训练。

三月的东北小兴安岭地区,积雪虽已融化,但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高空空投伞降部队,飞机在空中无地面引导,无气象资料,无地形图,无地形标志,无地形标志显示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目标上空,随即跳伞,连续飞行九公里,翻越三十九座山峰,涉过七条连续结冰河,行程四百多公里,出色完成了空袭、空袭以及破坏“敌人”交通设施和机场的训练任务。

据空军空降兵训练部介绍:我国空降兵经过野战生存等方面,已经探索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验,作战技能达到了新的水平。

曾考察过西欧国家伞兵部队的空军中训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我国伞兵部队在特种地形武装跳伞技能及野战生存能力上,可以与世界上最先建立国家的伞兵相比。”

济南军区后勤部加强班子、队伍和制度建设

本报济南讯 济南军区后勤部在端正党风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收到了明显效果。

在端正党风中,济南军区后勤部努力转变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营房部的干部下去部队吃喝比较普遍,各部队抓党风后,他们把有无吃请问题作为下部队回来汇报时的一项内容。今年以来,营房部多次组织干部下部队,到了一百三十八个单位,没有一个违反规定吃请的。

军区后勤部党委注重机关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理想、宗旨教育,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教育,遵纪守法教育,把树立典型榜样与剖析违法违纪案例结合起来。军区后勤部党委先后表彰了王立勤、祁翰成、田素芬、王云奎、周德富等九名优秀共产党员,表彰了党风好的三个单位。把他们的事迹迅速巡回报告、印发材料、广播、幻灯等多种形式,介绍给基层部队、干部、战士震动很大。

军区后勤部党委还十分注意制度建设,完善各业务部门的规章制度。财务、军需、军械、油料等部过去都是不公开的,群众不知道哪些事情该办,哪些事情不该办。在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根据本部门的特点制定有关规定,使制度公开化、系列化、规范化。领导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鼓励大家勇于向上级反映真实问题,并对反映情况的同志进行表扬。

(王 健)

胶东观测站坚持不解抓党风 年年圆满完成卫星观测任务

本报讯 国防科工委某部胶东卫星观测站党委、纪委坚持不懈地抓党风建设,带动了各项观测试验任务的完成。全站二百八十八名党员,五年内无违法违纪案件,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全站连续七年无行政责任事故,连续两年无车辆事故,圆满完成了十多次卫星、运载火箭及其他大型科研试验任务。

三年来,胶东站领导班子的成员,纪委书记换了三位,纪委书记都秉公办事,以身作则。第一任书记孙丙坤,对不良倾向敢抓敢管,被大家

黑龙江用经济手段控制会议 实行经费包干 严格审批制度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8日电 (记者张诗坚)黑龙江省委采取经济手段严格控制会议。据统计,1985年黑龙江省政府会议费达二千零一十九万元,居全国第二位。今年1至6月,支出的行政会议费占全年计划指标的84.8%。目前,省直机关召开的会议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为此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严格控制会议的措施:实行会议经费包干制,超过部分财政部门不予核销;严格会议的审批制度,没有省委或省政府办公厅填写的会议通知单,接待部门不安排参加会议的人员的食宿,财政部门不予核销会议费。省委还要求各级纪检部门把控制会议和压缩会议经费支出作为端正党风、严肃纪律的重要任务之一,经常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认真查处。

日前,省里已将控制会议的文件下发省委、省政府表示,他们将带头精简会议,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在精简会议的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话等现代化手段,指导工作。

上海冶金系统读书活动活跃

新华社上海10月18日电 (记者李春林) 上海冶金系统职工现已有读书小组四百三十多个,参加的人数五千多名,占职工总数的37%。读书小组既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又学习各项应用技术。他们还积极涉足书评评论、电影评论、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技术革新。在不久前举办的全国首届“星光杯”电影评论征文比赛中,上海冶金系统有十四篇作品获奖,占全国获奖总数的10%。上钢厂第三转炉车间的读书小组,去年通过读书活动搞成技术革新十四项,获得经济效益十一万元。

万里在南京会见麦考伊

新华社南京10月19日电 (记者殷学成)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中午在南京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总理麦考伊和夫人一行。

万里对总督一行在苏、以及即将到北京进行参观访问表示欢迎。麦考伊总督高兴地谈了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苏州、无锡、南京等地秀丽风光的良好印象。

首先考虑宪法和法律有什么规定,而是首先考虑领导有什么权力,然后才考虑领导有什么责任。这件事说了什么话,本来,领导人的话,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才应照办,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就不应该执行。而我们的一些执法干部,是把领导的话看得高于宪法和法律,这是错误的。

《依宪执法理力举》,王声宪回忆被占私房”一文,还向我们指明一个道理:处理历史遗留的案件,也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平反的平反,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坚决维护。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又有些复杂情况,就对公民申诉置之不理,坚持错误的决定或判决。

“何黑板”小传

前不久,我访问了一位让人敬佩的老人——“何黑板”。

他叫何玉祥,五十九岁,是河南省许昌县长村张乡司法所长。“何黑板”是他的绰号。咋得的?说来简单,靠一块小黑板挣的。

有人说,现在搞政法工作的,人想秉公办事比较难,人情世故,上下级关系难处理。这也是实际情况。但说起来嘛,要真正坚持原则也不难,何玉祥就是靠一块小黑板解决了这方面的许多难题。第一次,一位砖厂专业户违反承包合同,何玉祥按经济合同法进行调解处理。这个专业户搬来县里一位领导讲情,要求从轻处理。那位领导与何玉祥是多年知交,知交知交,原则归原则,何玉祥毫不含糊。他立

我是一位局长参加法律常识培训学习,由于考勤好,一丝不苟,刻苦钻研,考试时对答如流,喜得满分,成绩名列全班之冠,荣获优秀学员奖。

可是,他学习后回到单位不到一星期,得知检察院、安办部门正在侦查的一起案件,牵涉到他的宝贝儿子,便四出活动,托人求情,企图为儿子开脱罪责。并唆使儿子与同案犯订立攻守同盟,给案件做设置了重重障碍。

学习、掌握法律知识,为的是更好地依法执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倘若学习法律知识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得到一张证书,或仅仅要求别人依法执法,而自己却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这样的学习“满分”又有什么用?这种学习法律知识“满分”的获得者,在守法执法方面只能打一个“零分”。上面提到的那个局长,实际上已经违反了法律,还该给予必要的处理。

(林扬风)

英外交大臣认为英女王访华很成功

据新华社香港10月19日电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今天早上在香港机场对记者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利普亲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很成功的。对中国女王的欢迎规模盛大。杰弗里·豪曾随同英国女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说,他和中国领导人都认为,双方在执行中英联合声明方面进展得很好。



河北省清河县农民乡长旺村农民、河北省政法函授大学学员张贵山(左一),在村里办起了法律服务所,利用农闲时间给村民上法律课,并协助村党支部先后解决了五十户农民侵占宅基地的“老大难”问题,被农民称为“庄户律师”。图为他在法律服务站给群众讲解法律。

新华社记者 赵连升摄

绛县领导学法用法效果显著

运用法律手段 加强科学管理

本报讯 山西省绛县在普及法律常识工作中,从领导班子做起,县委、人大常委、政府、政协、纪委的领导干部联系实际,带头学法用法。目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已在这个县的各项工作体现出来。

绛县领导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管理。县委书记李桂香通过学法认识到,审计是国家管理和监督经济的重要手段,便依法审计作为运用法律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大力支持审计工作。在配备审计干部时,他以是否能够依法办事为标准。在出现“审计难”、“处理难”的问题时,他提出“审计不留情,留情面不消”,力排干扰,为审计干部撑腰壮胆。全县在两年多时间内,共审计一百七十六个单位,审计资金达二千五百多万元,其中违纪金额二百四十五万元,上缴财政六十五万元。副县长赵森发现县供销社拖欠公款七十九万多元,便召开供销社系统干部职工大会,讲解经济法规和有关政策,用法律手段解决归还欠款难的问题,仅一个月时间,就有二百多名干部、职工归还欠款三十多万元。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廷秀在认真学习宪法以后,积极发挥大法律家的作用。有三个乡镇干部以权压法,随意罢免三个村委会主任职务。廷秀对这种违法的做法,认真进行调查,进行了妥善处理。去年植树造林时,郝庄乡牛庄村村委会主任和乡党委书记顶了几句嘴,便被撤换了职务。县人大常委会知道后,及时派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上明讲话,使干部提高了认识,重新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恢复了那位同志的村委会主任职务。

绛县领导干部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不是就案办案,而是抓住典型,以案释法,扩大教育面。去年年初,全县违反规定买卖房、窑基地之风盛行,几个月间就在一百一十户干部、职工和个别农户间,成交房、窑二百六十九间(孔),宅基地三十九亩多,成交款项达五十多万元。纪委会副书记张秋良通过学法,从宪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城镇个人建造住房管理规定的规定中,认识到房子不可买卖,但宅基地不能买卖。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不坐等上级指示,主动查处这个问题,要求纪委和县政府既要积极查处,又要做好思想工作。使干部受到教育,合理合法。在县委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月工作,全部查清并处理了县城买卖房窑宅基地的问题,刹住了这股风。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引枝在接待群众来访中,受理了黎家村范怀义继承纠纷案。范怀义原籍不是黎家村,因其岳母有一条子不尽赡养义务,他便来岳母养老送终,其岳母去世时留有遗嘱,让女婿继承她的财产。

但是,村干部说女婿没有继承权,不准其安家落户。郭引枝同志两次深入该村,向群众宣讲继承法,做思想工作,并找到遗嘱原件和两个证明人。郭引枝同志认了范的继承权,圆满解决了范怀义的落户问题。

薄一波在纪念山西牺盟会五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牺盟会是我党统一战线正确路线产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孙勇)纪念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五十周年党史座谈会今天在京结束。

牺盟会成立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1936年9月,名义上由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任会长,实际上是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牺盟会成立后,发动和组织了百万以上的群众,组建了九十个左右团的山西新军,建立了七十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配合我军三大主力创建了山西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初期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企图消灭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但其阴谋被粉碎。1940年,牺盟会基本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山西新军则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历史曾被歪曲,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才恢复其本来面目。

中顾委副主任、当时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负责人薄一波在座谈会上说,牺盟会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的产物,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抗日斗争光辉史上的重要一页。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牺盟会及其所属工、农、青、妇救会等团体的会员曾发展到近三百五十万人,抗战八年多,有一万多名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同志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斗争历程告诉我们,党领导牺盟会、决死队在策略运用上是成功的,斗争经验是丰富的。这些经验,是统一战线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在会议期间看望了与会的老同志。

广西百色地区在京举办民族经济开发展览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右江流域民族经济开发展览》暨《美术、摄影作品展览》于10月9日至27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傅 博)

王声宪收回被占私房 依靠宪法据理力争

农民王声宪最近喜气洋洋搬回被非法侵占三十年的房子,结束了三十五年漂泊和上访生活。他逢人便说:“我们国家的宪法真管用!”

王声宪是安徽省广德县石鼓乡七塔村农民。1951年土改时,政府按政策分给他家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1952年,王与其妻结婚时,县法院又把这三间瓦房的产权判归他所有。1955年搞“土改补课”时,将他“补”成地主,又因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被送去劳教,房屋无人居住,某个领导人就宣布将房屋没收,交七塔村使用,但没有办任何法律手续。后来,房子又被卖给供销社。1962年王声宪向县请愿被释放,回到原籍已无栖身之地,多次申请要求退回自家房屋,没有结果。

1979年,王声宪根据当时宪法第九条的规定,诉诸法院解决他的房屋产权问题。当时的区法院和石鼓公社派员到村上调查,查明那三间瓦房的产权确属王声宪所有。但公社一位副书记指责王声宪“尾巴巴”,无理取闹,当着众人面前抓着王声宪衣领带到公社关押起来,胁迫王写一个三间房不属于他的声明。

这事被县委知道以后,于1979年12月两次派人到石鼓乡了解情况,支持王声宪的要求,让公社归还王的住房。但那位副书记从中作梗,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80年春,王声宪带着宪法上县里申诉。他指着宪法条文说:“这里明明明白写着‘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财产权’,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谁都得执行!”广德县政府也以王的要求合理,但又怕会引起连锁反应,就指示七塔村给王另盖一间新房居住。王声宪认为,这样处理不符合宪法精神。1982年新宪法公布施行后,他又捧着宪法上访了。

在这期间,广德县、宣城地区两级法院曾两次裁决驳回王声宪要求归还原房产权的起诉。王声宪曾向《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敦促当地地方法机关按宪法规定处理此事。1984年4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调阅了案卷,又派人下去调查,与当地有关方面磋商,采取个折衷办法:原房不退,另找两间房给王居住。王声宪则坚持说:“坚决要求按宪法办,否则给座金堂宝殿也不要。”



王声宪

干部要有“宪法观念”

本期法制园地《依宪执法理力举》,王声宪回忆被占私房”一文,反映出在某些基层干部的头脑中,还没有确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的观念。而而没有这种观念,就不会了解公民享有哪些权利,从而自觉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该文提到那位侵占副书记,就是根本不管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只按自己头脑里“王法”行事的人。这些说明,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无法无天”的思想还相当严重,还要下大力气才能解决。干部中缺乏“宪法观念”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些执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不



1985年12月,经过省高院审判委员会重新讨论决定:撤销地、县两级法院1982年对王声宪房屋产权的不当裁定,发还王的住房,以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今年4月12日,广德县信访办告省高院,县委书记曾两次到实地察看,并与当地干部进行了研究,意见是:全县类似王声宪的情况有一百多户,如归还王原住房,影响面不小。省高院民庭负责同志当即强调指出,应按宪法办事。8月1日,宣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撤销1982年地、县两级法院不当裁定,再次把三间瓦房的产权判归王声宪所有。为了执行判决书,石鼓乡石鼓乡长将七塔村长的门,将三间瓦房的大门钥匙交给了王声宪。

(王信和)

领导革命事业的历史记录和丰碑

——新版《孙中山全集》评介

陈 铮

在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十二卷本《孙中山全集》（正文十一卷）出版了。这是我国出版史和学术史上的的一件大事。新版《孙中山全集》（以下称新版《全集》）是迄今为时规模最大、收文最多的孙中山著作集。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驱者，是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敬仰的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半个多世纪来，国内先后出版的孙中山著作全集或辑集有数十种之多。这文集内容和学术内涵不同，都为研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1956年孙中山九十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孙中山选集》，收入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六十多万字，对研究孙中山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选集》的内容只限于孙中山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言论，不可能全面具体地反映孙中山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貌和革命生涯的艰苦曲折。而对于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开创一代历史的大人物，不论从政治上和学术上来说，都应该包括他的全部。有鉴及此，从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就与有关学术部门和一些专家学者商议编辑出版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孙中山全集。由于“文革”的动乱，这个计划无法实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现代史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历史系通力合作，集中力量，从事《孙中山全集》的编辑工作，并被列为国家“六五”计划社会科学的项目之一。

孙中山遗留下来的大量著作，不但他领导革命事业的历史记录和丰碑，而且，作为孙中山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后来的人们可以从这份精神遗产中吸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编好一部内容完备的孙中山全集，首先要尽可能地搜集、考订、整理孙中山的著作，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到全面、准确、细致。新版《全集》的编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经过几年的努力，除了采用国内各种中山大学已经刊印的论著外，还广泛深入地搜集到珍藏在国内外的中外文字报刊原件，以及发表在罕见报刊上的重要讲话。新版《全集》共收孙中山的文集、专著、新报、谈话、书信、电报、宣言、公文、命令、批示、序言、题词、诗词和译著等八千多篇，计五百多万字。收文之多超过以往各种版本的孙中山著作集。四十年代重庆众志书局出版的黄季陆编《总理全

集》，共收文一千五百多篇，约一百五十万字。七十年代台北版的《国父全集》，收录孙中山著作五千多篇，近四百万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部内容最为丰富的孙中山全集。而这次出版的新版《孙中山全集》比台湾版的《国父全集》所收孙中山著作又多出二千多篇，字数增加四分之三以上。

新版《全集》第一卷收入1890到1911年的著作近四百篇，比台湾版《国父全集》所收同期著作多一百余篇。本卷是了解和研究早期孙中山的重要文献。首卷第一篇是孙中山1890年所写的《致郑瑞如书》，陈述了效法西方要振兴农桑、戒绝鸦片、发展教育的三项建议。这是现在所见到的孙中山最早阐述见解的一篇著作。该文写作的时间比各种孙中山文集所收最早的政论文《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要提早四年之久。同卷在《上李鸿章书》之前还收有孙中山执笔、郑观应修改过的《农功》一文。中国领导者在1883—1885年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使孙中山痛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开始产生倾覆这个政府的思想因素。而从首卷所收前几篇的主要著述中，又说明了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把国家兴盛的希望寄托到清朝某些官员能够实行兴利除弊、改良政治上上来。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新版《全集》第一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反映了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从一个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转变成为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包括《振兴中国，维持国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盟书》和《香港兴中会章程》等；有广州起义失败流亡美国时，在“伦敦致家书”的有关书信、谈话和记述；还有中国同盟会盟书、联络暗号、总章和有关文章、讲话、揭贴《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的誓词，以及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公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主要点；同时该卷也反映了从南方武装起义直到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朝统治的内容。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新版《全集》第二卷收录了孙中山这一年的著作六百六十九篇。它是《总理全集》所收同期著作的五倍，比《国父全集》同年著作也多一百多篇。本卷增加的新资料中，有一批是得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收藏的原件，有的是从《崇报明报》等罕见报刊上发现的。此卷所收有

作记录了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政府、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行一系列新政法律法令，以及他为谋求国内和平、实现南北统一、争取外交承认而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前后的言论。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极力破坏辛亥革命成果，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加复辟帝制的步伐。《全集》第三卷所收孙中山1913至1916年间的著作六百多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专制自立的阴谋，为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拯救民主共和国而艰苦奋斗的记录。

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经过三次，以袁世凯之死而告结束；但帝制复辟的土壤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失败而改变。继袁世凯而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弄约法、解散国会的事件依然发生，并且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丑剧。面对复辟复辟逆流，孙中山挺身而出，发动了历时七之久久的护法运动。孙中山1917年至1923年间约四千篇著作，分别编入《全集》第四至八卷。这个时期的著作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写下了他为维护被毁弃的临时约法、争取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击败张勋复辟帝制，反对军阀割据，平定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斗争经历。这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斗争最曲折最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多量言论、著述、文件，保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开始新的历史转折。

1924年孙中山思想和实践发展进程中最光辉的一年，也是他论著最多的年份。新版《全集》第五卷，共收孙中山1924年至临终前的著述二千五百篇，比台湾版《国父全集》同期著作增加一倍。这三卷连同前几卷有关著作，为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一步总结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以及国共合作在反帝反封建运动、创办黄埔军校、建设南方革命基地、平定商团叛乱，举行北伐战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谋求国内统一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提供了比过去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新版《孙中山全集》不仅力求所收著作完备，而且在资料鉴别、版本选择、时间考订、文章注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当然，新版《全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孙中山致力于革命数十年，足迹遍及国内许多地方，而且长期奔走海外，交往的国内外人士众多，《全集》以外，收藏在国内外团体或个人手中 and 刊布于国内外报刊上的孙中山著作，无疑还有不少。目前已陆续有新的著作发现。编者现已着手广泛征集资料，准备出版《孙中山全集》补编，使该书更臻完善。

存异方能求同

邹乃山



多年来，我们对“同”偏好而对“异”有偏见。例如欣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习惯于一言堂、一刀切、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反之，似乎一切异都是消极的东西。“标新立异”在我国是贬义词。这种长期的大一统，定于一尊、思想一元、党同伐异等传统有关。鲁迅曾不以为然地指出：“‘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但一切理想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见《热风》）可见对异不能一概排斥，要取分析的态度。

现代科学认为，没有差异，不能构成生机勃勃、内涵丰富的系统。所以差异是有序之源，而有序是构成有生命力结构的必要条件。一切引起是有顺序的差异，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积极力量。就社会而言，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调节机制，以制约破坏社会稳定性的力量和行为。但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不是越来越单调贫乏，而是越来越丰富多样，对差异也有更大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主张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不能理解为建立乌托邦式的无差别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产生的差别以后，还存在着由于天赋和其他条件形成的差别。至于未来物质极大丰富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了，个性不是泯灭，而是更加自主自觉地发展。既然个性更加充分发展，差异的存在就是必然的。

何时能只根据历史的发展事实不合理的差别，而用三类差别对应的合理差异也应运而生。在我国现阶段，至少有三类差别对社会的发是有利的。

第一类是求同过程中的差异，如为求得共同富裕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求得统一认识而允许认识过程中的差异，象近年来解决干部对农村责任制认识的不同。

再一类是中性的差异，如衣着、饮食、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等方面偏好的多样性，只要这些偏好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和他人自由发展，尽可听其所好，不必强求同化。

还有一类是积极互补作用中的差异，对这类差异不仅应该允许其存在，更要着力保护并予以尊重。如没有百家争鸣，就没有百家繁荣；没有百花齐放，就没有文艺繁荣；没有不同意见的充分探讨，就没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没有多种经济成分的配合，就难以给造和补缺；没有从实际生活和其学说中吸取新的营养，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对于上述差异，存异方能求同，求同必存异。可以说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解决内部矛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本来千差万别的人们内部矛盾，有的固需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统一，也有可以让他们共存，不必强求一致。特别是对学术或思想性质方面的问题，不象工作方面的问题必须及时作出决定，完全可以让它们在相互尊重、相互等待的和谐气氛中更从容地切磋和商讨。真理本身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对某些差异的宽容和对独立思想的尊重，是对本身力量有信心表现，无须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强求统一，无须借助权势和高压来树立权威。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信息渠道多元化了，议论多了，思想工作难做了，简单的批评指责不起作用了，这看来似乎是一种退步，其实却是进步。因为只有在思想活跃和发扬独立思考的条件下，真理才会经得住批评得到发展。我们没有理由感叹不如昔，而应当毫不迟疑地发扬民主和宽容的精神，让真理在宽松的环境中显示其强大的力量。

从义和团运动想到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李 侃

最近一个时期，联系义和团运动，初步思考了一个我认为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有三种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兴的阶级力量，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主要是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农民为主体，先后发动过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反帝爱国战争；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先后发动过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四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课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比较而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联系比较密切一些，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比较广一些。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的联系则并不那么密切，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相对地显得狭窄一些。

从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任何改良和革命都要失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要落空。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太平天国失败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以求强富相济的洋务运动，根本不去也不可能去注意农村、农民和土地问题，企图把近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建筑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保持封建的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接近近代化的“洋务”，结果是一败涂地。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变法事业局限在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不但不去重视农村和土地问题，而且担心农民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变法失败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脱离农民群众，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似乎注意到农民和土地问题，在同盟会的纲领上写上了“平均地权”的内容，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然是一次失败的革命。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中国共产党以前，在中国没有哪一个阶级、政党、哪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真正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作用，从而能够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

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发动农民改革土地制度，然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以什么方式可以用农业集体化来发展农业生产，逐渐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逐步过

渡到共产主义。然而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农业互助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现实生活又一次显示了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潜力。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粗浅的也是很不成熟的想法。多年来我们似乎把对近代农村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上，而对两次运动的研究又是集中到关于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事件发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战争的攻守进退，人物的过失是非等等问题上，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以往这种研究范围、课题和方法，远不足以科学地历史地说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听到所谓“史学危机”的说法，说得浅白一点，就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什么关系。我并不主张历史学者“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也不赞成搞现实历史与历史现象的简单类比，但我觉得历史学的研究，总要给人们以智慧、借鉴和启示，有助于人们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看到历史前进的趋势，从而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我们都承认农民和农村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说对近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中，从政治、民情、历史传统的研究中，认识得比较清楚？至少我自己是没有比较清楚的理性认识。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曾深刻指出，当时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性质、形态，他分析说：“这是封建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我们虽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这就是对近代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历史和现实的概念概括，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可惜，以后三十年的实践，并没有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过分过急强调集体化、公社化、忽视商品经济，批判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理论和“左”的思想政策指导下，使得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改变。

既然清醒地认识到建国初期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么当然就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仍然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农村和农民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情况并未改变，不但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甚至还有进入近代。在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农村和农业生产中去批判什么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的躯体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去割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阻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造成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而我们对近代农村的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的困难程度，可以说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当然不是说有了这种研究，就能够改变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但是至少使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头脑比较清醒，尽到了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浪潮中，人人都认识到平均主义或叫“吃大锅饭”是阻碍改革的习惯势力。而平均主义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思想障碍，孔子就讲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说法，都是要以平均的办法来调节和社会矛盾。至于历代农民起义，大多是以“均贫富、等贵贱”为号召，到太平天国可以说把平均主义发展到更全面而更“彻底”而理想化了，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在反对阶级剥削

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又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一种幻想。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思想。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要绝对平均分配有限的物质财富，实际就是“平均”贫穷。平均主义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土壤，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成，很值得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结合上，进行一番分析研究。

这里，我还想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谈谈农村文化问题。如果说建国前夕，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末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生活差不多也是停留在古代。首先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无文化，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在文化科学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长期的封建、落后状态，必然造成思想文化的闭塞和蒙昧。而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又长期浸染农民的思想意识。在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的余毒不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状态，甚至比改变经济贫困更为艰巨。近年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讨论日益多了起来，似乎成为史学的一个“热门”，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不敢妄谈深层次的、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文化问题，只是从直观感性地感到，文化总离不开人们习于不识字，有知识没有知识，知识多和知识少没有关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文化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文化与“治人”，读书与做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广大农民既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也被剥夺了受教育、掌握文化的权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上既是富有的，又是贫困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富有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是贫困的；古代传统文化是富有的和灿烂的，近代文化却是落后的和薄弱的。我认为不论从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出发，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研究近代文化史，都不应该忽略农村和农民文化问题，不能从长远的战略上着眼，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不去正视历史造成的严重文化落后，势必妨碍和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当然，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远不止上面说的内容。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广阔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拓、发掘和深化。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本报有删节）

向全国饲料加工业、畜禽饲养场、乡镇企业、专业户提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

9PSJ—500型 配合饲料加工成套设备

我厂是河北省机械电子工业厅生产饲料机械的定点厂，我厂生产的9PSJ—1500型、9PSJ—500型和9PSJ—300型饲料加工成套设备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专家、教授设计的。9PSJ—1500型、9PSJ—500型和9PSJ—300型分别通过河北省机械电子工业厅和河北省科委鉴定。其中9PSJ—500型一九八四年通过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鉴定总站鉴定，荣获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推广许可证书》，三种饲料加工成套设备，搅拌均匀、耗电、噪音、粉尘低，具有国内同类机型的先进水平。我厂还生产大型石工成套设备、食用油精炼设备、35型制砖机、颚式破碎机等产品。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参加订货会。

本厂于11月5日召开产品订货会，北戴河火车站有接站车。（请参加单位于10月30日前函告我厂）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项目	9PSJ-1500	9PSJ-500	9PSJ-300
生产率(公斤/小时)	1500—2000	500—1000	200—400
电耗(度/吨)	5—7	6—7	5—6
噪音(分贝)	75	<60.02	65
数机容量(千瓦)	16.3	7.7	4.5
噪音dB(A)	85	84	87

9PSJ—1500型 外形尺寸：(长×宽×高)4350×1850×2650(毫米)

9PSJ—500型 外形尺寸：(长×宽×高)1550×1850×2050(毫米)

9PSJ—300型 外形尺寸：(长×宽×高)2500×1430×2750(毫米)

产品三包 代办托运

河北省抚宁县通用机械厂

厂址：抚宁县城关 电话：423 电报：2623 开户银行：抚宁支行 帐号：40007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机。作为一个光辉的起点，中国现代文化在这里开始了崭新的重建工程。与这个光辉的起点相联系的一位巨人——鲁迅，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意识在痛苦中的觉醒。对于这样一个文化巨人，具有超越简单的政治分析，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析，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其思想价值，才能真正充分地展示其难以估量的文化价值。值此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已经进行了进一步从文化视角重新认识鲁迅的时候了。

在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鲁迅这一代曾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盛唐文化在强大的国势之下，一度难容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撞击，通过融合而超越之的事情，已是“远哉邈焉”了。中华民族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撞击，但它总是在在有权强国的处境中接受这种撞击了。这就给中国人的心灵中投射以浓重的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即便是严复著《天演论》，固然有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的意向，但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来解释世界民族之关系，又何必不在某一个角度折射了这种危机感？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思考，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危机中振振出来，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爱国志士的思维焦点，成了他们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自觉反应。青年鲁迅正是在这种时代需求中，提出他的充满进取精神的文化构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其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自血战，个性张，涉猎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这可以视为鲁迅在本世纪初叶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所采取的总态度和基本纲领。它要求对民族的文化价值在不失其信心的前提下，加以辨析、扬弃和选择；对世界文化思潮，则在打破闭关锁国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去占有、挑战和拿来。前者推动他对中华民族之脊梁的追寻，后者形成他对外来文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正是出自这种民族巨人的崇高情怀和开放性的胸襟，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者，架起了中西方文化生命与世界文化进步思潮的桥梁。

记得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历史和个人大体相似，它每一次只能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之。鲁迅对于民族文化之态度，鲁迅之这种双重的态度，并非花费同等的注意力和精力去付诸实践的。就他那一代文化先驱者而言，横向借鉴西方现代文化之精华，使我们这一代古老民族的文化从封闭的僵硬的传统中返老还童，乃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正是为了封建传统的纲常名教扼杀人的个性，有鉴于当时的新派人物在汲取外来文化时畸重于“制造国货”等物质文化和“立宪国会”等制度文化，鲁迅以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为镜，提出“首在立人”的原则，倡导主体精神文化的建设。即所谓：“诚若为今立计，所当循从既往，相度方来，格物而致其明，任个人而排众惑。”^① 静止地看，这些话似乎唯唯之心。但是从事文化进程的动态环境看，就不能不承认，鲁迅把这一代中国封建社会常怀文化之一个弊端和陋习，他追求人摆脱中庸或庸庸气息的自由创造价值，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代意识的高度上重新组合，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价值。

在这种文化反省中，鲁迅的心灵是充满痛苦的。他的一生，有过追求后的寂寞，有过呐喊前的沉默，有过探索中的彷徨，也

在痛苦中觉醒的民族灵魂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杨义

有过受“围剿”时的孤独。这种无比深刻文化反省，用他的话说，竟是一种“创痛激烈”的“快心自食”。他目睹了中华民族历史失去了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一次是戊戌政变，失去了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的政局逆转，失去了走法、美民主共和道路的机会。历史的悲剧使他不能也不愿做那种“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梦，也许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估价不足，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的深刻剖析，堪称古往今来的第一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民族自强精神和民族自我批判精神的极高层次的统一。他带着一种类似“原罪”的圣洁心情，和民族一起承担苦难。他严峻地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迫切性；衰老的国度“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瘦削形体消瘦，组织间又缺乏了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十四年的“读经”》）这种历时数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有碍于在世界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中取仕补苴；“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自己变得符合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这种民族文化的畸形同化力，只不过是鲁迅更严峻的“修补老调”的故伎的延长。在鲁迅这种深刻的文化反省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两度失去现代文化良机的血的教训。

从本上说，鲁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大批判者。他对封建文化的剖析和批判，是各角度和深层次的，体现为对现实文化的结合、道义和实效的结合，风俗和心理的结合，眼光逼人，犀利而深邃。他既从历史渊源上掘了封建文化的“祖坟”，又从朝代兴衰中透视封建文化的本质，还从国民心理上揭示封建文化的沉积。尤其是对在封建社会内闪烁着圣光的儒家学说的批判，更为针见血。他不仅看破了孔夫子为“治民众者”设计“出色的治国的方法”的初衷，道破了历代以至国民的统治者拿孔子当“敲门砖”的历史荒诞性，而且剖露了儒家礼乐文化制造看似无事的社会的残酷性。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托古改制”，把孔子打扮成变法的先驱，到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声疾呼“仁义道德”的背弃有“吃人”的本质，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康有为的思维方向是顺传统，鲁迅的思维方向是逆传统的。平心而论，儒家文化并非没有可资继承的精华。但是当一种古老的传统如梦魇一般缠绕和压迫着现代生机的時候，走出梦魇之境，是回首重评价值全部旧梦的决断条件。只有从根本主动掘“代圣贤立言”，这些传统残存，才能造成全面评价我们民族作为一个“古物陈列馆”存在于世，一再呼唤人们走出这个“活埋坑”，毁灭那个“人肉的筵宴”，这种逆传统正是文明国恢复青春运的希望所在。鲁迅的《祝福》是通过一个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批判礼乐文化的虚伪性和理学的

麻木本质。《周礼》把礼区分为吉、凶、军、嘉、嘉五类，主祭祀的吉礼居五礼之首。鲁四老爷的社会正是在喜气洋洋地举行祭祀祀天的吉礼之时，给一个善良勤劳的妇女设计一座阎王佛椅的人间地狱。这种深刻的逆反心理，在往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源泉。对于儒家文化，鲁迅思想具有浓郁的异端色彩。为了反对保守和虚幻，光大民族的脚步实地、勤于进取的文化传统，鲁迅对于先秦文化是扬周、墨，而抑儒、道的。儒、道是先秦诸子中的两派，鲁迅的抑扬反汉代以后“独尊儒术”之道而行上，实际上是以前秦扶周的精神为先秦诸子争平等地位，从而恢复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活性的。

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实际上是对于唤起对民族文化在社会心理的历史沉积作一番具有革命意义的清理。对改造国民性的关注和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贯穿了他的日本留学时代、北京时代和上海时代。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的创作动机，就是解剖国民心理的弱点的。以如此热烈的心关切着民族的灵魂深处，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的庞大队伍中也属凤毛麟角，就这种意义而言，在他的葬礼中覆盖道体的旗帜“民族魂”，是对他最崇高的盖棺论定。鲁迅在这方面的创见是异常丰富的，并非一短篇幅所能论述清楚。他最恶毒的国民心理弱点是：卑怯、奴性、虚伪和自欺。卑怯、奴性，以屈从现状、虚伪以粉饰现实；自欺以逃避现实——它们共同构成封建等级制度中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对于这种心理状态，鲁迅作了一副对于：“两眼下视黄泉，青天就是假假；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屁。”（《华盖集·忽然想到（五）》）对于这种文化沉积所造成的社会丑闻，鲁迅作了这样的概括：“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华盖集·北京通信》）对于这种心理畸形，鲁迅不仅画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阿Q相”，而且画了一幅比西洋人少了一点“野性”的可怜的脸谱：“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中国人重伦理人情，这自然包含着不能不承认的优点，但因“儒者尚礼”而失去却取性、冒险性和竞争性，就成为现代化的心理障碍了。在解剖国民性的问题上，鲁迅具有民族巨人的博大胸襟，他毫无“家丑不可外扬”的狭隘心理，而是抱着爱之愈切，责之愈严的心情，以敏锐的眼光搜索到我们民族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他又毫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短小眼光，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世界各大文化系统中的民族心理进行横向的比较，深刻地揭示我们民族心理的特点和弱点，旨在促使横膈于孙摆脱沉重精神负担，走向现代化的未来。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理性光辉，愈经时间的淘洗，愈是令人惊服。

瞿秋白认为，鲁迅思想的进程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种理论模式揭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十年代前期尤其显得高屋建瓴，难能可贵。但是在时间的考验面前，不难发现，这种理论模式带有单线性特点，侧重于政治哲学，

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意识，因而难以充分地概括鲁迅全人及其全部思想价值。一个很明显的的问题是鲁迅前期接受西方了西方的进化论、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但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思想素质，完全是鲁迅式的，而不是尼采式、或托尔斯泰式的。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鲁迅具有过人的文化意识，并以这种文化意识对外来思潮进行深层次的整合组合，从而有效地保持了鲁迅思想的主体创造功能。到了鲁迅的后期，社会阶级意识确实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是在他那些最精彩的杂文中，文化意识并没有减弱。比如，他前期曾经批评过：“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到了后期谈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的时候，阶级论的色彩显然增添了：“车夫坐在路边赤膊蹬车，并不算什么，富家老爷坐在路边赤膊蹬车，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脸’，要给老爷鞠了一躬，就鞠躬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华盖集续编·论“面子”》）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且介亭杂文·论“面子”》）正由于后期鲁迅不是生硬地加阶级论到处去贴标签，而是得心应手地把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进行高度的融合，他的许多思想以其独特的理性光辉，不仅出色地感应了他的时代，服务于他的时代，而且出色地超越了他的时代，使人们在这个不推“理论阶级”为纲”的时代中依然感受到其深刻的真理性和现实的超越作用。至于他后期一再谈论“家庭为中国的根本”，思想从中西文化之比较中加以说明，而以刘安成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仙传说的模式加以印证（《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根本》），所有这些都不是某种简单的阶级论的理论框架所能概括的，而必须采用文化的视角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毫无疑问，鲁迅最能超越时代、最具生命力的一项重要价值，存在于他那种卓尔不群的文化意识之中。他作为思想家、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是他以严峻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透视五千年来的文明古国之社会弊端的文化根源和文化传统；他作为文学家的最有建树的地方之一，也是他以犀利的文化眼光，透视中国社会之悲剧和喜剧，过去和未来。惟此，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革新者和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之卓越先驱者。一座丰碑，通过痛苦而深邃的文化探索，接通了两座桥梁：一座是横向的，即中国古文化生命联结世界进步文化思潮的桥梁；一座是纵向的，即中国古老的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桥梁。虽然他留下许多工作有待新时代的人们予以继承，但他这种伟大的文化史地位却是谁也无法取代的。



文学的探求和选择

陈骏涛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一体化到多样化发展的历程。作家和批评家们对文学的思考、探求、主张越来越多样，从趋同而走向异。这种艺术上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如今，创作方法大一统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代之以多种创作方法的共存并峙。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甚至仍然是一种最主要的创作方法。但是，在现实主义之外，我们有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感觉印象派，以及现代派。从更普遍的情况看，则出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感觉印象派以及其他现代派的相互渗透和交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些被称为“朦胧诗”派的新潮青年诗人的诗作，实际上只在精神上与现实主义相通，而在创作方法上，则已离开了现实主义。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不是现实主义方式“再现”生活，而是通过诗人自我的“中介”达到对生活的“表现”。舒婷通过诗人内心深处的忧伤的、柔婉的、细腻的情感抒写，表现诗人对生活的某种追求和憧憬，趋近于浪漫派的诗作；北岛通过对瞬间意识的捕捉和因陈不定的象征组合，表现诗人对生活的某种哲理性的思考，趋近于感觉印象派的诗作。同时，小说界也悄悄地发生分化。大部分小说仍然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有相当一部分小说则在并不离开现实主义的前提下，显示出更为开放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开放现实主义”。有的或与浪漫主义相通，有的或与象征主义相通，有的或与现代派相通，也有一些小说却很难划入现实主义范畴。有时候，同一个作家，却使用好几套技法：写实的，荒诞的，意识流的，象征的，超现实主义的综合……总

涉及到文学与现实、与人的关系上，其目标和追求就更为复杂了。

二、文学本性的多样。文学究竟是什么？以往人们的回答是单一化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或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回答原本不错，但却过于单一，它无法回答文学的本性。其实，向来对文学本性的观念就是多元的。有客观的再现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反映，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有主观的表现论，认为现实和历史都是精神的物化，文学是文学家主体精神力量的表现。还有主客体的统一论，认为文学是客观再现和主观表现的统一，是作家的主体精神与他所处的客观世界的完美的结合。如今，对文学的本性的解说则更加多样。刘再复同志用一段话对文学的本性作出不同的观照：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克服现实，使人性得到暂时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人格和思想情感的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文学也可以是有缺陷世界的一种理想之光，等等。

三、文学功能观的多元的多样认识。在文学的诸种功能中，人们过去较多强调教育功能，甚至把它绝对化、庸俗化，要求文学对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如今，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比较开阔，也比较全面了：教育、认识、审美、娱乐，这是一个整体，但对不同的作品则会有不同的侧重。有人则，对文学功能的多元有共同的认同的态度，树立一种比较豁达的文学功能观，有益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有益于文学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的多方面的需求。

他们思索着走向世界

记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作曲家群梁茂春

今年6月下旬在香港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演出并观摩了数十部出自大陆、香港等地青年作曲家的大作新曲。他们从大陆应邀与会的十余名青年作曲家，七位出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同班同学。他们是：谭盾、叶小钢、瞿小松、陈怡、周龙、贺绿汀、陈其钢。他们的作品已在国内外崭露头角，成为我国音乐创作“新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思考、探索及创作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八十年代我国青年作曲家群体的风格特征。

这批“小字辈”的青年作曲家，正是时代的产儿。他们赶上了我国音乐发展的最好的时机。他们多是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于“文革”以后第一次招生考入作曲系的。“十年浩劫”使这所高校音乐创作被破败，也使社会上积压了成批热切想学音乐的青年人，“择优录取”的原则聚集起了全国一些出色青年作曲家迅速成长的良好学术环境。

中央音乐学院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教学水平高的教员队伍。他们入学后，得以直接同赵祖昌、杜鸣心、苏夏、赵行涛、罗忠熔等学习。教师们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条件，发掘着他们潜在才能。学校一方面注重传统技法和民间音乐等基础课程，另一方面还开设了“西方现代音乐”、“美国音乐”等新课程，提供了几个观察世界音乐的小窗口，使他们在学校得到了较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

任何人才的成长需要一定外在条件，也需要主观努力。这批青年经历了“十年浩劫”这场民族灾难，大多都当过农民，或在工厂当过工人，许多人都曾在文艺团体当过演员。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也注重创作实践。几年来，先后有谭盾的交响乐《离魂》，叶小钢的提琴奏鸣曲《中国之夜》，瞿小松的大提琴奏鸣曲《山歌》和谭盾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在国内外的几次音乐作品比赛中获奖。

这是团结而活跃的一群。他们的观念存在着普遍性，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的音乐观念不一样，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以很融洽地彼此探索及创作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八十年代我国青年作曲家群体的风格特征。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们在追求着一个高远的目标——寻找振兴中国音乐之路。他们正思索着从民间音乐走向世界。这些青年音乐家探索的特点在哪里呢？主要在于音乐观念和创作手法的创新。他们冲破了划一的美规则，体现了充分的多样性、开放性，在创作中发掘了创造性。新的审美意识解放了音乐创作的题材，有的禁区渐渐被冲破了。在这群年轻人的作品中，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小提琴协奏曲、钢琴曲，有表现远古历史题材的混合室内乐作品，有描绘祖国山河和民间风情的交响曲、钢琴曲，有表现哲理冥想的交响曲等。即使采用古代题材，也多是注入浓厚的当代意识，表现今天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寄托。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在追求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在探索民族音乐语言与现代音乐技法相交融的可能性。对于外国的现代音乐技法，他们采用消化吸收的办法，因此，这些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体现了创作技法、音乐语言、声音材料上的前所未有的大突破。

“大突破”并不就等于艺术的大成功。今天，这些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大都还具有实验的性质。他们作品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创作手法趋于过分复杂化，以至与听众存在着较大的间距。他们似乎热衷于用偶然素材作自由变换的手法，过多地采用无调性、无调性的音乐，以至又出现了新的雷同，陷入了新的框框。一个尤为重要任务，是他们对我国无比丰富和生动的民间音乐宝库，亟待作更深入的了解和开掘。



徐州重型机械厂

徐州重型机械厂积三十年之经验和技能，生产的“海虹”牌8吨、12吨、16吨、20吨、25吨、32吨全液压汽车吊采用中外先进技术，有巨大的起升性能；优良行驶能力；操作轻快的转向机构；美观、安全、舒适的驾驶室；强劲的车架和齐备的安全设施。其中16吨汽车吊双桥驱动，60吨的强大型起重力矩，双卷扬，其性能可与20吨汽车吊相当。8吨汽车吊具有17.64米的最大起重量和长寿命的卷扬系统。

立杆作业车，国内独家生产，12吨、16吨、20吨、25吨汽车底盘，愿为您的各种专用车辆配套。多年来，我厂以可靠的质量，充足的备件，一流的服务博得用户的赞誉。“海虹”牌产品遍及全国。若要效益高，请用“海虹”吊！

“海虹”“海虹” 力大无穷！

徐州重型机械厂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召开产品和备件订货洽谈会，欢迎全国广大用户与我厂取得联系，以便安排食宿。

厂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路50号 电话：23912、24361、23801 电报：3029

“某公”与“诸公”

谢云

每期《读书》，差不多都有丁聪同志的一幅漫画。这些画，有的使我莞尔而笑，有的使我掩卷沉思。最近看到的一幅，载于该刊第七期，却勾起了我小小的议论。

漫画画的是一个委员会进行表决的情形。长方形会议桌的一端，主持人（不书记、主席一类人物）神态咄咄逼人，“反对（我）的请举手”；桌的两边坐着七个人，七只手都作欲举而又不敢举之状，显得惶惑、尴尬而可怜。漫画自是佳作，但被神秘思想之余，不免对画的题目《某公的民主作风》略感遗憾：如果改为《一言堂里众生相》，岂不更能体现画的内涵的丰富？也许这是画家人心存厚悻，但我以为，现在的题目对于“某公”以外的“诸公”，未免过于宽容了。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在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总要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皇帝的存在是因为有当臣民者，当臣民不愿再做臣民的时候，皇冠便落地了。有信仰的人们，才有神的威严，当人们从迷信的王国走进了科学的王国，神也就无庙可归了。大大小小的一言堂之所以能巍然矗立于神州大地，除了家长“某公”的不民主外，实在也离不开堂员“诸公”对不民主的纵容和屈从。只谴责“某公”的不民主，而过于原谅了“诸公”对不民主的屈从，怕是扼杀不了一言堂的。

《邵氏闻见录》里讲了一件事：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文臣即位之一日，率执事等跪坐，文臣曰：我目昏，可持手书来看者。唐等起呈覆，欲复位，已密令去其座矣。遂为故事。封建时代的皇权，是够大的了吧，但为了剥夺大臣们坐着说话的权利，皇帝也不得不耍点小计谋。如果当时范质等敢于按唐制要求把被撤走的座位再拿回来，也许后来大臣见君之礼会是另一个样子。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个代表大会或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在决定问题时，每个人的票都算同等的分量。

这是白纸黑字载于章程的。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表意见，举手投票（不论赞成或反对），不只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某公”一言，“诸公”唯唯，或心有异议却欲言而噤，手欲举而彷徨，甚至“某公”出尔反尔，“诸公”也随风转舵。这恐怕不能怪“某公”，“诸公”实在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患了软骨症！

自然，遇到不民主的“某公”，“诸公”也自有其难处，例如怕引起恶感，甚至遭到打击报复等等。但封建时代，并没有什么民主集中制，一些正直之臣，面折廷争，与皇帝反复辩驳，代不乏人，有的甚至不顾杀身之祸，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今日不民主的“某公”们，虽然也可以给不顺从的“诸公”穿穿小鞋，但毕竟并无生杀予夺之权，何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要打击报复更见其难。如果今天的“诸公”仍然不敢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言、投票，那么最好的办法恐怕只有：呈请辞职，免得贻误工作，并有负推举自己的群众的信任和委托。对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其实，那些不民主的“某公”们，恐怕也未必便是天性专横，多半是在“诸公”的宽容下，逐渐由比较民主走向比较不民主，再走向专横的。看起来，那“诸公”担惊受怕的样子，象个小媳妇，怪可怜的。其实，他们跟“某公”原本是她嫖嫖的，只是由于自己过于懦弱，才使“某公”升为嫖婆的。较起真来，还得负点纵恶之责哩！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改革，革去体制之弊，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这自然十分重要。但好的制度也得由人们来实行和维护，才能由纸面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并进而成为习惯。否则，日积月累，浸淫衍化，好制度也终不免于沦为一种摆设。细察历史和现实中，由民主集中制演变为一言堂制的过程，此说大致不妄。

四个字可以当作成语来看待，老画家的丝瓜以具体的形象创造性地体现了这四个字。我种丝瓜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看，看丝瓜怎样由小变大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隔夜瓜获得这种感受的。这位老画家笔下的嫩丝瓜，却给我一种“欲滴”——正在迅速向下伸展的幻觉。画家不只给观众提供了可视的丝瓜的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生动的形象里，表现出画家对于这种欣欣向荣的事物的爱。以这种可以直接感受的爱感动着观众，让观众分享这种爱，引起观众与画家在情感方面的交流。传统绘画有“画中有诗”的说法，画家的丝瓜也是无声的诗。我不惯于向人要画，但这次却提出给我画幅丝瓜的希望。我还每年在小院里种丝瓜，但看现实的丝瓜也不能代替我对老画家赠送我的这幅丝瓜的观赏。

当出版社的编辑托我给《于希宁画集》写前言的时候，我从《丹青世界——“秋斋”》的文章里得知，老画家在十年内乱中种过丝瓜。看来正如他画梅要到各处观赏梅树那样，他画丝瓜也经过了反复地观察客观世界的过程。观察客观世界不只是为了造形的准确生动，更重要的是获得由衷的、不与人苟同的创造意图和意境。当读者观赏他那充满活力的《新荷》、《牡丹》、《水仙竹石》、《天池》等作品的时候，未必能直接领会画家在画外的努力。然而正是经过许多画外的努力，这些作品才这样富于艺术的魅力。

（本文为《于希宁画集》撰

写的前言）

丝瓜（中国画）
于希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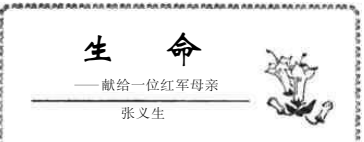
象田野的风，自由的心愿
一阵比一阵紧；
象沟旁的野草，拒绝路人的
践踏与怜悯。

风雪一起刮开严寒，
和细雨走进春天的田垄，
种下浸泡过的折愿，
连同鹅黄色的梦。

七月流火，
在他们心灵的原野上，
开出了金黄色的蒲公英，
去采摘吧，
那里有真诚。

复归了平庸，这才平安无事！
呜呼！平庸的太平！

伊人



生命——献给一位红军母亲

潘大夫从参加红军到今天，已经半个世纪了。当年她是那个充满青春活力、俏丽的年轻女战士，现在已是鹤发苍苍，皱纹如网的老人了。尽管岁月无情，潘大夫已到暮年，并且已被批准离休，但是她那双充满伟大母爱的眼睛，依然关注着医院的妇产科。她时时站在开满鲜花的窗台前，顾盼着距离不远的医院大楼，只要从那里传来小护士的招呼声，潘大夫心里就会明白妇产科室里有难产的孕妇，她会象一名战士那样召之即来，立刻投入抢救大人与婴儿的战斗中。几十年来给她接生的有多少婴儿？那是无法计算的。而每当她站在窗口，望着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匆匆来往的人群，听着托儿所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看到微风里飘动着少先队员身上的红领巾，她的面前，总会浮出红军过草地时难忘的一幕。

在潘大夫家的墙壁上，挂有一幅出自自家的油画：一位红军小分队正艰难地行进在电闪雷鸣风雨呼啸的茫茫草地。战士们一面和敌人作战，一面掩护红军伤病员撤退。画面的中心，是一位红军女战士抬着担架，在齐膝深的泥泞中奋力跋涉。这位女战士便是潘大夫。当年，她是一名年轻的卫生员，大家叫她潘花，被上级

派到这支小分队照顾伤病员，而她的年轻丈夫正在指挥连队突围。在前有敌、后有追兵、断粮缺水的恶劣环境下，潘花咬紧牙关随队伍转东绕西，拐南向北，甩掉了敌军重重包围。在征途上，经常是时而烈日如烤，时而冰风呼啸，一天里就有四个季节的气候，每迈出一小步都要付出极大艰辛，包含着生与死的拼搏。当小分队进入草地腹地，红军战士们燃起篝火烤着皮带充饥。

这时潘花已经无法再忍受腹部剧烈的疼痛了，她嚼着烧烤的小块牛皮，艰难地爬到长满蒿草的草甸中间，吃力的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非常可爱，迫不及待地用小嘴吸着母亲没有奶汁的乳头，尽管母亲用力用了很大劲，也很艰难地吸出一滴乳汁。

月光笼罩着无边无际的草地，一湾清波浮草腥的浊水，里也铭刻在我们共和国烈士纪念馆的大理石上。当年红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陕北时，廖承志同志听到女卫生员为照顾伤病员，毅然舍弃自己的婴儿，感慨万分，并希望画家们能挥毫泼墨将此动人故事加以表现。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幅油画。作者把复制品送给了潘大夫。五十年后，她伴着这幅画面度过了一万八千多个日日夜夜。把对自己的宝贝的爱和思念，全部溶汇在革命的事业之中。她仿佛觉得，她的孩子还活着，活在她接生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婴儿的生命之中……

个性、活力、探索、开拓、进取、创造，这不是平庸所需要的元素。平庸需要的是惰性结构：无独立性、随波逐流、唯唯诺诺、等因奉此、千篇一律、有平庸无所有时才能披上平庸的服饰。然而新的平庸，终究还是平庸。叶甫图申科讽刺剧人物的信条：●要受到奖励就得平庸。●平庸的东西，一旦被当作“正味”的佳品，给予赞赏和鼓励，于是平庸也就趁机滋生，竟给予平庸了。●平庸的东西，一旦被当作“正味”的佳品，给予赞赏和鼓励，于是平庸也就趁机滋生，竟给予平庸了。●平庸的东西，一旦被当作“正味”的佳品，给予赞赏和鼓励，于是平庸也就趁机滋生，竟给予平庸了。

伊人

浩劫余年人未老

王朔

1982年4月，花鸟画家于希宁在南京开展画展。作品给我的印象很好，好在画境清新。白梅、绣球、扁豆、藤萝、玉兰、梅竹……，画得格调新鲜，有独特的境界，风格似黑土与青衣并蒂。当时画家七十岁了，但那些画使我觉得他那充满活力的情趣正当壮年。用他自己的诗来比喻，是“浩劫余年人未老”（《清明登雨花台》）。老画家同我们一起看画，还开了座谈会。在会上，他说他过去的取材较宽，后来才逐渐集中到花卉、鸟也少画了。画法是先工笔、后写意的，形象是逐渐由繁到简的。在从事绘画的整个过程中，“变法”的思想没有间断过。他说近年来多画梅，是“四人帮”逼的——那时只准画梅。他在南方各地，现场观察了各种梅花。为了形象富于动态和活力，着重画老梅树而不着重画折枝。基于对梅的反复观察和体会，在花瓣、蕊蕊、花萼的造形方面发展了前人的画法。他认为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是随着画家的生活经验与创造意图而变化的。后人不要模仿前人的形式，盲目学习就不免丧失自己作品的生意——也就是独特的艺术个性。

观众对绘画的欣赏不带主观性，我对老画家画的丝瓜特别感兴趣。也许因为我种了两年丝瓜，对他画的丝瓜格外亲切。“青翠欲滴”

四个字可以当作成语来看待，老画家的丝瓜以具体的形象创造性地体现了这四个字。我种丝瓜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看，看丝瓜怎样由小变大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隔夜瓜获得这种感受的。这位老画家笔下的嫩丝瓜，却给我一种“欲滴”——正在迅速向下伸展的幻觉。画家不只给观众提供了可视的丝瓜的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生动的形象里，表现出画家对于这种欣欣向荣的事物的爱。以这种可以直接感受的爱感动着观众，让观众分享这种爱，引起观众与画家在情感方面的交流。传统绘画有“画中有诗”的说法，画家的丝瓜也是无声的诗。我不惯于向人要画，但这次却提出给我画幅丝瓜的希望。我还每年在小院里种丝瓜，但看现实的丝瓜也不能代替我对老画家赠送我的这幅丝瓜的观赏。

（本文为《于希宁画集》撰

写的前言）

丝瓜（中国画）
于希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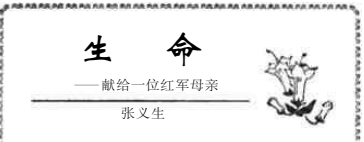
象田野的风，自由的心愿
一阵比一阵紧；
象沟旁的野草，拒绝路人的
践踏与怜悯。

风雪一起刮开严寒，
和细雨走进春天的田垄，
种下浸泡过的折愿，
连同鹅黄色的梦。

七月流火，
在他们心灵的原野上，
开出了金黄色的蒲公英，
去采摘吧，
那里有真诚。

复归了平庸，这才平安无事！
呜呼！平庸的太平！

伊人



生命——献给一位红军母亲

潘大夫从参加红军到今天，已经半个世纪了。当年她是那个充满青春活力、俏丽的年轻女战士，现在已是鹤发苍苍，皱纹如网的老人了。尽管岁月无情，潘大夫已到暮年，并且已被批准离休，但是她那双充满伟大母爱的眼睛，依然关注着医院的妇产科。她时时站在开满鲜花的窗台前，顾盼着距离不远的医院大楼，只要从那里传来小护士的招呼声，潘大夫心里就会明白妇产科室里有难产的孕妇，她会象一名战士那样召之即来，立刻投入抢救大人与婴儿的战斗中。几十年来给她接生的有多少婴儿？那是无法计算的。而每当她站在窗口，望着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匆匆来往的人群，听着托儿所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看到微风里飘动着少先队员身上的红领巾，她的面前，总会浮出红军过草地时难忘的一幕。

在潘大夫家的墙壁上，挂有一幅出自自家的油画：一位红军小分队正艰难地行进在电闪雷鸣风雨呼啸的茫茫草地。战士们一面和敌人作战，一面掩护红军伤病员撤退。画面的中心，是一位红军女战士抬着担架，在齐膝深的泥泞中奋力跋涉。这位女战士便是潘大夫。当年，她是一名年轻的卫生员，大家叫她潘花，被上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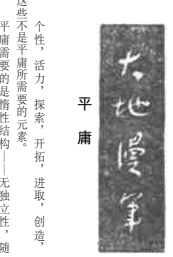
派到这支小分队照顾伤病员，而她的年轻丈夫正在指挥连队突围。在前有敌、后有追兵、断粮缺水的恶劣环境下，潘花咬紧牙关随队伍转东绕西，拐南向北，甩掉了敌军重重包围。在征途上，经常是时而烈日如烤，时而冰风呼啸，一天里就有四个季节的气候，每迈出一小步都要付出极大艰辛，包含着生与死的拼搏。当小分队进入草地腹地，红军战士们燃起篝火烤着皮带充饥。

这时潘花已经无法再忍受腹部剧烈的疼痛了，她嚼着烧烤的小块牛皮，艰难地爬到长满蒿草的草甸中间，吃力的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非常可爱，迫不及待地用小嘴吸着母亲没有奶汁的乳头，尽管母亲用力用了很大劲，也很艰难地吸出一滴乳汁。

月光笼罩着无边无际的草地，一湾清波浮草腥的浊水，里也铭刻在我们共和国烈士纪念馆的大理石上。当年红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陕北时，廖承志同志听到女卫生员为照顾伤病员，毅然舍弃自己的婴儿，感慨万分，并希望画家们能挥毫泼墨将此动人故事加以表现。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幅油画。作者把复制品送给了潘大夫。五十年后，她伴着这幅画面度过了一万八千多个日日夜夜。把对自己的宝贝的爱和思念，全部溶汇在革命的事业之中。她仿佛觉得，她的孩子还活着，活在她接生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婴儿的生命之中……

个性、活力、探索、开拓、进取、创造，这不是平庸所需要的元素。平庸需要的是惰性结构：无独立性、随波逐流、唯唯诺诺、等因奉此、千篇一律、有平庸无所有时才能披上平庸的服饰。然而新的平庸，终究还是平庸。叶甫图申科讽刺剧人物的信条：●要受到奖励就得平庸。●平庸的东西，一旦被当作“正味”的佳品，给予赞赏和鼓励，于是平庸也就趁机滋生，竟给予平庸了。●平庸的东西，一旦被当作“正味”的佳品，给予赞赏和鼓励，于是平庸也就趁机滋生，竟给予平庸了。

伊人



1987年广东石湾建筑陶瓷产品质量咨询暨看样订货会

时间：1986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 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

展出佛山市陶瓷工业公司生产的五大类、数千个花色品种和今年新开发的数百个品种的传统与现代建筑陶瓷产品。同时展出佛山市室内装饰陈设配套公司采用佛山市陶瓷工业公司生产的宾馆卫生间、墙、地装饰砖配套装修的高级宾馆卫生间及建筑琉璃制品装修的亭、台、楼、榭样板。供全国各建筑设计院（室）、建筑工程公司（队）、建筑陶瓷经销公司（店）和有基建项目的单位参观、评议或订购。

报到处：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陶城大厦一楼 联系人：梁苏灿 罗健华 潘凤群 电话：72435 72017 82918

钟山牌手表更新换代·推出最新产品

17钻全钢三防中型表是令广大用户皆为满意的精美计时表

喜讯！喜讯！
《钟山牌》手表更新换代推出最新产品：
《钟山牌》17钻三防中型表荣获1985年
轻工部优秀新产品奖！
该表是轻工部钟表研究所广泛研究，
吸收国内外十几种机械表先进技术基础上
研制成功的定有南京手表厂新产品定有有机
设计独特外观小巧而性能稳定结构精巧
抗冲击力强走时准确可达52小时以上等先进技术
以南京手表厂的定装精确的走时低廉的价格
深得广大用户好评是令男女老少皆宜为满意
的精美计时表。
钟山表，表中之王！



荣获轻工部优秀新产品证书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设立
50家特约维修联保单位

南京手表工业公司 地址：南京中山门内四方城
电话总机：41177-41178
经销单位：南京手表厂 手表联营公司 电话：42555
南京百货站 43056